

导 言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作为生产国际化和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日益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着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对世界经济与社会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综合国力显著提高, 2001 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这一成就的取得, 无疑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吸收国际资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资本, 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 不仅缓解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资本短缺问题, 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 使国民经济走上了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三位一体发展的道路, 而且伴随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 与“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 效应, 使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高, 从而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即 TFP)。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 随着国际资本流入规模的不断扩大, 中国经济国际化呈现出新的特点, 由贸易导向逐步转向资本导向。一方面, 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增多, 生产规模扩大, 带动了投入品的进口和制成品的出口, 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另一方面, 国际资本流入增加, 直接引起中国国际收支流量的增加和结构的变化, 成为决定储备资产增减的主要因素。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不仅决定了中国一半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而且直接决定中国储

备资产的增减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对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后，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9·11”事件的不利影响，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的市场魅力大增，成为国外跨国公司青睐的热土。

未来 20 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 21 世纪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是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则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的关键内容，对外开放格局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利用外资战略和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

一方面，利用外资作为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国际生产日益广化和深化以及中国作为 WTO 成员方在享受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履行相应承诺的背景下，其形势会发生新的变化，呈现一些新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鉴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兴起和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迅猛发展。这些新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客观评价过去二十多年利用外资的实践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和政策进行重新定位以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事实上，在客观评价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利用外资实践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依据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适时调整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以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已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

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利用国内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

的另一重要方式，在中国外资战略已由“引进来”转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战略的背景下，扩展对外直接投资之于中国宏观经济均衡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在某种意义上，“走出去”是利用外资的更高层次），显然具有战略意义。而在新时期中国扩展对外直接投资将面临加入 WTO 后得自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消除的相对宽松有利的国际宏观环境。鉴于此，我们必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进行新的定位，探讨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举措，从而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上一个新台阶。

简言之，在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加入 WTO 后给中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积极有效地通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认真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本书的研究定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直接投资实践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引起了西方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以此为研究对象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提出了一系列旨在阐明境外直接投资动因及其条件的理论和模型，已经形成了数十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流派。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最初由海默提出，其后经维农、巴克利、小岛清等人的发展，到 70 年代后期由邓宁完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但纵观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经济学者们无不都是从各自的研究方向和角度出发，对国际直接投资活动这一经济现象作出了各自的解释。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沿袭国际贸易的标准理论来推演。其中具有代表性是利润差异论。利润差异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所涉及的资本在国际间

的流动从实质上讲反映了各国间资本收益的差异。根据利润差异论的观点，可以断定资本会从资金比较充裕的国家流往资金比较贫乏的国家，而当一国的收益降低时，流向该国的资本就会随之减少。另有 MacDougall(1960)的理论，侧重于用局部均衡的比较静态方法检验外国直接投资边际增量的分配。这类模型的重要假定是外国投资，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证券投资，都将提高东道国的劳动边际产出而减少资本边际产出。此外，MacDougall认为 FDI 还能给东道国家带来额外的利益。

二是根据产业理论来诠释。首创者是 Hymer(1960)其他重要的代表人物有 Vernon(1966), Kindleberger(1969), Caves(1971), Buckley、Casson(1976)和 Dunning(1973)。这条思路集中发端于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企业要到国外生产它们在国内也可以生产的产品。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多种垄断优势决定了它们能够在外国进行直接投资(Kindleberger,1969)。垄断优势分为三类：(1)是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如产品差别、商标、销售技术与操纵价格等；(2)是来自于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包括专利与工业秘诀、资金获得条件的优惠、管理技能等；(3)是企业拥有的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投资者的垄断优势决定了它们进入的方式和在东道国的行为方式。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随之得到了发展。主要有市场内部化理论、市场交易成本理论和邓宁(J. H. 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三是基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提出了许多理论。如由经济学家钱纳里(H. B. Chenery)和斯特劳特(A. M. Sturout)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储蓄、外汇吸收能力

等方面的国内有效供给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必需的资源计划要求量之间存在着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利用外资既能解决国内资源不足，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减轻因加紧动员国内资源以满足投资需求和动员国内资源以冲销进口而出现的双重压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坎特威尔和托兰锡诺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问题，提出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他们认为，技术创新是一国产业、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生产技术。在对外投资方面，它们已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的传统产品，而是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活动，如台湾省、新加坡、韩国和香港特区等。

四是应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加以佐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P. Romer)、卢卡斯(R. 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而且，在新增长理论家们看来，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不再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而是双方获益的“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就世界上总体资源使用效率来看，生产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为发达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有利于新产品的开发活动。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可以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

五是针对以往理论的局限性进行的修正。近年来，经济学者们就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而发生的。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试图从新的角度阐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强调间接诱发要素包括经济政策、法规、投资环境以

及宏观经济对国际直接投资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以往诸多理论都仅从资本、技术、管理和信息等直接诱发要素方面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从而导致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

中国利用外资实践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国内学术界和企业界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中国利用外资实践的研究。这些研究大体上是随着中国利用外资开始的，既有宏观战略性的，也有微观策略性的；从研究的领域来看，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有法律文化方面的；从研究的切入点来看，不少学者一改西方国际直接投资主流理论单纯从跨国公司分析入手的方法，充分考虑了东道国的能动作用。归纳国内学术界和企业界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中国利用外资实践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借鉴研究。以介绍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为主，并沿用其理论概念和分析范式针对中国利用外资的现象和问题加以解释说明。应该说，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利用外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也对人们认识和了解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方法，以及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西方理论固有的缺陷以及中国利用外资出现的新特点，因而这些研究难以摆脱西方理论先天不足的束缚，甚至有些只是西方理论的复述。二是务虚研究。这类研究着重应用现代经济分析工具，且引进被西方理论所忽略的有关因素，试图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和范式。其理论分析的思路和方法是十分有价值的。但由于许多方面照搬西方的假设前提和分析工具，其结果，看似理论完整、分析严谨，实则缺乏可操作性，因而很难从理论的殿堂中走出来指导实践。三是务实研究。这类研究是针对中国在利用外资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寻找其对策。其优点在于及时解决现实中暴露的问题，针对性强，但多少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从长远看，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同时，对理论本身的发展意义不大。

国内学术界和企业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研究也基本上始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之时，但相对于中国利用外资问题的研究来说较为欠缺，主要着眼于对策性分析，理论研究尚不到位。

针对上述现状，本书试图寻找另一种方式，力求理论联系实际，从理论性与可操作性的结合上，来研究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全面、系统地从客观评价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实践出发，探讨新时期中国外资战略调整。需要指出的是，其一，本书所探讨的外资战略调整，不仅仅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而是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纳入外资战略的框架来予以考察，如前所述，在某种意义上，对外直接投资是利用外资的更高层次，因而将其纳入外资战略的分析框架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其二，鉴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本书将绝大部分笔墨用于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战略的探讨上，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仅用较少笔墨予以探讨。

三、本书的框架与内容

按照上述思路，本书的大体构架是：

第一章，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按发展脉络作了简要综述，其中择要对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如：海默（S. 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R. G.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巴克利（P. J. Buckley）和卡森（M. C. Casson）的内部化理论，小岛清（Kiyoshi Kojima）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邓宁（J. H. 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投资发展水平理论，威尔斯（Louis. T. 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Sanjaya Lal）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等进行了扼要介评，旨在把握其形成发展的脉络，分析其理论贡献及其局限性。针对FDI主流理论的缺憾，本书着力强调，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作为东道国

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在与跨国公司投资利益的博弈过程中，对国际直接投资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东道国在吸收外资促进发展的过程中，能发挥能动作用。这正是东道国确定外资战略目标、制定政策的有力理论依据。

第二章，论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外资方面所走过的历程，并对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本章对新时期中国利用外资呈现的趋势以及变化进行归纳。

第三章，论述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本章结合中国二十多年来利用外资的实践，以定量分析手段刻画了外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并对中国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进出口贸易效应和劳动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第四章，以定性分析手段客观描述了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与冲突。本章重点分析了利用外资过程中“以市场换技术”的得失，利用外资与发展民族产业的矛盾和利用外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旨在阐明：利用外资本身是有代价的，支付的成本不是“货币”，而是准许进入的本国市场，利用经济资源的机会，以及给予外商的各种政策优惠；购买的不是简单的“商品”，而是由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一揽子要素组合而成的比较成熟的生产能力，从而进一步廓清在利用外资时要追求高质量高效益、降低成本和代价的认识。

第五章，论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于宏观经济均衡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提升的战略意义。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一样，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利用国内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方式。在继续积极“引进来”的同时，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机和条件已基本成熟。

第六章，探讨新时期中国利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与政策取向。本章首先探讨新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的战略定位、战略调整和政策选择，其次探讨新时期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战略举措。

第

1 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概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直接投资实践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其增长速度不仅超过了世界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超过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根据 2002 年 9 月 18 日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发表的《2002 年世界投资报告》^①的资料，2001 年全球 FDI 为 7350 亿美元，虽然与 2000 年创记录的 1.3 万亿美元相比，猛跌了 51%，但其规模仍然是庞大的。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引起了西方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以此为研究对象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提出了一系列旨在阐明境外直接投资动因及其条件的理论和模型，已经形成了数十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流派。本章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一个系统的回顾，并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20 世纪 60 ~ 70 年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初步形成阶段；(2)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快速发展阶段；(3)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最新进展阶段。

^①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002.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初步形成

1960 年美国学者海默（S. Hymer）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被誉为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开山之作，也标志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初步形成。在此之前出现的利润差异论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出现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初步形成阶段的典型代表。

一、利润差异论

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由于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价格，价格的不同会造成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在不同的国家移动。其中各国利率的差异造成了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国际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通过跨国生产的方式所形成的资本流动。二战结束初期，由于对国际直接投资研究还没有深入，经济学家便将国际贸易理论直接运用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利润差异论。利润差异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所涉及的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从实质上讲反映了各国间资本收益的差异。根据利润差异论的观点，资本会从资金比较充裕的国家流往资金比较贫乏的国家，而当一国的收益降低时，流向该国的资本就会随之减少。利润差异论现在已经很少被提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存在着严重缺陷，因为它忽视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质（即它是跨国公司的管理控制在国际上延伸的工具），而把国际直接投资仅仅片面地理解为资本转移的一种方式。另外，利润差异论不能够说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的关系，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国际直接投资会成为资本

转移的主要形式（因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证券投资比直接投资优越得多）。利润差异论最大的缺点应该在于它无法解释现实中有关国际直接投资的真实现象，如现实中国际直接投资在收益率下降时，并没有相应地减少，而是仍持续地大量增长；再如现实中绝大部分的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从一国往另一国单向流动，而往往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双向流动。

二、垄断优势理论

对于如火如荼迅速发展的国际直接投资，如前所述，利润差异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出现。1960年 美国学者海默（S. Hymer）在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①中首先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篇论文于 16 年之后由其导师金德尔伯格（C. P. Kindleberger）推荐发表，并经金德尔伯格^②以及约翰逊（H. G. Johnson）和凯夫斯（R. E. Caves）^③等学者补充、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这个理论被称为垄断优势理论。由于海默和金德尔伯格对该理论的巨大贡献，垄断优势理论又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传统”（H-K Tradition）。

垄断优势理论系统论证了企业的垄断优势和国内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垄断优势论认为市场不完全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而如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运行是完全有效的，则国际直接投资就不能发

^① Hymer, Stephen (1960),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 MIT Press.

^② Kindleberger, Charles (1969). *American Business Abroa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specially, pp. 1 - 36).

^③ Caves, Richard (1971).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Economica*; V. 38, pp. 1 - 27.

生。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既不完全又是不可避免的，以下不同类型的市场不完全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商品特异、商标、特殊的市场技能或价格联盟等原因造成的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由于规模经济造成的市场不完全，由于政府的有关税收、关税、利率和汇率等政策原因造成的市场不完全，由于特殊的管理技能、在资本市场上的便利以及受专利制度保护的技术差异等原因造成的要素市场的不完全。

上述不同类型的市场的不完全性使跨国公司拥有垄断优势，这种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到海外建立子公司，是由于它拥有某种垄断优势，因而能够获得比国内市场高、并超过东道国当地竞争者的收入。正如金德尔伯格所说：“直接投资的兴旺必定是因为存在着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或是存在着造成市场分割的政府或企业对竞争的某些干预。”一般来说，跨国公司拥有如下垄断优势：拥有先进技术是跨国公司最重要的垄断优势，大型跨国公司拥有极强的科研力量，并投入巨额资金开发新技术，拥有一流先进技术；与拥有的先进技术相适应，跨国公司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总结出了一整套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先进管理经验，对生产经营活动实行高效率的管理和控制；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国际专业化生产，避免本国和东道国市场对规模经济（一般来讲，企业生产规模越大，越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限制，跨国公司利用各国生产要素的差异，通过横向一体化取得内部规模经济的优势，通过纵向一体化取得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并使之转化为公司内部的利润；大型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信息灵通；大型跨国公司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公司总部可以在公司内部各子公司之间灵活调度数额庞大的资金，这是一般国内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大型跨国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销售系统，且与国际包销

商有长期而稳定的业务联系，在销售成本和便捷方面占有优势；大型跨国公司大都历史悠久，影响面广，产品更容易打入国际市场。垄断优势论的结论是：垄断与优势结合，是跨国公司从事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

垄断优势理论突破了国际间资本流动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贸易理论框架，突出了知识资产和技术优势在形成跨国公司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一理论也有偏颇之处，它沿用静态分析方法，没有阐明跨国公司特定优势的发展，也未能论述各种市场不完全竞争状态的变动性。还有，垄断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产品出口、技术转让与国际直接投资各自的适用条件。再有，垄断优势理论对于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不能够给出有效的解释。

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在波斯纳 (M. A. Posner) 1961 年提出的技术差距论的基础上，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弗农 (R. G. Vernon) 于 1966 年 5 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生命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首次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The Product Life Cycle Model)^①。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后来经过威尔斯 (Louis T. Wells) 和赫希 (Hirsch) 等人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弗农认为，垄断优势理论的理论分析还仅仅停留在静态的阶段，不足以说明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企业的垄断优势和市场营销的产品寿命周期 (营销学中一般将产品从进入市场到退出市场的全过程分为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等四个不同

^① Vernon, Raymond (1966),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 80-#2, pp. 190 - 207.

的阶段)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在国际供需平衡的假设前提下,弗农依据产业从工业发达国家到后发工业国家、再到开发国家的顺次转移现象,将产品生产划分为导入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三个阶段。导入期作为第一个阶段,工业发达国家率先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国内市场顺利开拓,并开始向后发展工业国家出口,逐渐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成熟期作为第二个阶段,随着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原进口国亦能生产同类产品,这时亦存在大量的跨国投资和技术输出;标准化期作为第三个阶段,国外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产品出现逆流现象,发达国家逐渐放弃该产品而转向开发更新的产品,从而开始新一轮产品生命周期的循环。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说明,企业从事跨国直接投资活动是遵循产品生命周期的一个必然步骤。该理论对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给予了有效的解释(由于准确地描述了战后跨国公司的一般成长过程,弗农的模型在理论界风行了相当的一段时期);对于那些刚刚开始进行跨国投资的企业和与最终产品相关的跨国企业的经营行为,该理论也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弗农在后来对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地强调了跨国公司的寡占行为,并将跨国公司的寡占行为与产品生命周期的三个阶段联系起来,对跨国公司随产品生命周期变化而变化的经营决策行为给予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其中关于跨国公司之间的博弈行为的分析得到了其学生尼克博克(F. T. Knickerboker)跟进行者模型的进一步论证和大量实际观察的支持。尼克博克于1973年发表的《寡占反应和跨国公司》在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公司寡占理论。跨国公司寡占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寡头垄断厂商会相互跟随进入新的国外市场,这是一种以国际直接投资作为防御武器的战略,即进行防御性投资。在

寡占的市场结构条件下，一旦一家跨国公司对某国直接投资，其他跨国公司也会跟着这家厂商对该国进行投资，以抵消第一家跨国公司行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统计资料表明，美国企业在二战后进行的大量国际直接投资明显地集中在寡占市场结构明显的行业。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虽然能够较好地解释战后美国公司对外投资行为，并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形成过程，但是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首先，该理论不能解释企业直接在国外开发新产品并组织跨国生产的现象，许多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并不遵循上述三阶段的规律。其次，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防御性的逆向投资和双向交叉投资现象，其中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资迅速增长，这一趋势也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无法解释的。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快速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第一，国际经济学界的学者们在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理论，试图解释各个发达国家特定时期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由此产生了内部化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平行 / 垂直联合体模型以及货币优势论等理论。第二，由于在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中，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崛起使得世界国际直接投资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并逐步形成了美、欧、日三足鼎立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格局，从而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综合创造了条件，约翰·邓宁 (J. H. Dunning) 首次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综合，提出了著名的折衷范式。第三，由于受 20 世纪 80 年代不断加强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直接投资

理论发展的推动，国际生产折衷范式得到突破，约翰·邓宁进一步提出了投资发展水平理论。第四，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推动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形成。

一、关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进一步理论阐释

（一）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实际上是源于产权经济学理论，从企业组织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

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1, 1975, 1979）依据科斯（Coase, 1937）的交易成本理论（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率先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认为企业市场交易的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的协调费用的时候，企业会实现交易的内部化），指出企业组织结构的革新（包括创立一个内部市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内部控制的损失。威廉姆森的理论对大型企业的增长问题已经有了比较强的解释力。在此基础上，英国学者巴克利（P. J. Buckley）和卡森（M. C. Casson）在1976年合作出版的《跨国公司的未来》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内部化理论^①。该理论后由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 M. Rugman）在1981年出版的著作《跨国公司的内幕》中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部化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公司在进行经营活动中会面临各种市场障碍，为了克服外部市场障碍或弥补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公司就有动力将交易改在公司所属各个子公司之间进行，从而形

^① P. S. Buckley, M. Casson: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Macmillan, 1976.